

黎明的文学

——中国现实主义作家茅盾

松井博光著 高鹏译

薄明の文学

中国のリアリズム作家・茅盾

浙江文艺出版社



黎明的文学

——中国现实主义作家茅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60515

松井博光 著

高鹏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李均生

黎明的文学

——中国现实主义作家茅盾

松井博光著

高 鹏译

*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25 插页3 字数173,000

1984年3月新 一 版

1984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7,500

统一书号：10317·130

定 价：0.80 元

代 序

呆在屋子里，很想隔窗向外面望望。现在，外面正笼罩着一片迷雾。那象是朝雾，又象是暮霭，也许是雾雨，或者是夜幕。总之，屋里和外界被隔断了，除了朦朦胧胧之外，什么也看不见。连外界传来的声音，也因为雾幔遮隔，成了带有瓮声瓮气的那种奇妙的响声。在这样的時候，中国人常常用“闷”字来表现它。这大概就是“心情不舒畅”或“心情抑郁”的意思吧！

茅盾在京都，经常感到为雾所包围而产生的那种“闷”的苦恼。他不断写下“闷”的文字寄回本国，似乎想以此来冲破那抑郁的心情，希望豁然开朗。当时的茅盾，究竟描绘了怎样的内心活动的景象？我将从这里入手作为本书的开端。

我之所以这样处理，是因为满怀希望和友人一起参加了大革命的茅盾，在遭到意外的挫折而逃往避暑胜地牯岭的时候，同样是为浓雾所包围的；他避过国民党的监视，潜回上海，隐居于住宅的三楼，将自己的苦恼倾注于那些满怀希望投身大革命的青年男女知识分子，特别是女性们在遭到失败后的悲惨境遇，写出了他们的群像图——《蚀》的时候，上海虽无浓雾，

却完全湮没在所谓“乌烟瘴气”之中。从《蚀》、《虹》、《子夜》直到《腐蚀》、《霜叶红似二月花》，只从他的长篇小说的书名上推究，就不难看出他由于大革命失败所受到的心灵的创伤，这一创伤，明显地深深印在他的小说中。

起初预定为《夕阳》的书名，最后改为《子夜》。在出版时他将叶绍钧手写的篆书作封面，并采用了在扉页题字的周围斜印了多行英文字的图案。英文字是“The Twilight; a Romance of China in 1930”。这里的 Twilight 果真是指薄暮或是黎明吗？而书名《子夜》只意味着深夜，解放后在北京出版的修订本英译书名是《Midnight》（《午夜》），因此，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译名，并且围绕着如何解释它引起了争论。在这争论中，也出现过对茅盾的文学的性质有疑问的论调。

为了从“闷”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渴望迷雾能尽快消散的心情，大概与等待天亮，盼望黎明的心情是相通的。可是，没有尽头的黑暗之夜，打破了人们的希望。《子夜》中一位登场的人物说：“黎明前的天空，有一段非常黑暗的瞬间，那是繁星逝去，月亮消失的瞬间。”而在《子夜》脱稿之前，他在另一篇文章《我们这文坛》中，把不朽的名著在文坛出现之前的作家的苦恼，比喻为夜，他在文中写道：“朋友！天亮之前有一时间的黑暗，庞杂混乱是新时代史前不可避免的阶段，幼稚粗拙是壮健美妙的前奏曲，‘The beautiful agony of Birth!’据说这就是辩证法的进展，是铁的规律！”“只有竹子那样的虚心，牛皮筋那样的坚韧，烈火那样的热情，才能产生出真正不朽的艺术。”（《我们这文坛》）此外，他在一九三三年末，对冬天有了恶感，他在《冬天》中写道：“我知道‘冬’

毕竟是‘冬’，摧残了许多嫩芽，在地面上造成恐怖；我又知道‘冬’只不过是‘冬’，北风和霜雪虽然凶猛，终不能永远的不过去。相反的，冬天的寒冷愈甚，就是冬的命运快要告终，‘春’已在叩门。”“‘春’要来的时候，一定先有‘冬’。冷吧，更加冷吧，你这吓人的冬！”（《冬天》）

我之所以将本书命名为《黎明的文学》，并没有深奥的道理，它只是在对上述问题所作的百般思考中，突然产生的命题。或许命名为《薄暮的文学》也未尝不可。因为在小说的范围内，结局只是黑夜的世界。总之，我认为茅盾是以大革命失败的体验为基础，学习了西方的写实主义，并以这作为唯一的目标，在黑暗之夜探求摸索的作家。他凝视着为无穷尽的浓雾所笼罩的茫茫黑夜，渴望着雾幔尽快消散，黎明早些到来。我们回顾往事，就会发现他的足迹是在中国“新文学”（现代文学）的现实主义轨道上前进。当然，解放后停止了写作的茅盾，就只好暂且置于本书的视野之外了。

目 录

代 序	I
-----	---

第一章 雾、虹和红叶

——茅盾在京都

一、京都的雾	2
二、茅盾到日本和景云里	7
三、虹和红叶	12
四、阴阳镜和岚山	22
五、《从牯岭到东京》和《读〈倪焕之〉》	31
六、长篇小说《虹》	38
七、京都的邻人	49

第二章 文学研究会与大革命

一、和商务印书馆进行交涉的年青人	56
二、“新社会”小组	61
三、叶绍钧、孙伏园、周作人等人	73
四、商务印书馆的茅盾	80
五、《小说月报》的革新	90
六、创造社和茅盾	100
七、“五卅”前后	107
八、矛盾的爆发——广州和武汉	115

九、从牯岭到上海	122
十、《蚀》和《严霜下的梦》	128

第三章 三十年代的茅盾

——左联·《子夜》·《自由谈》

一、加入左联	138
二、上海事变和商务印书馆	142
三、瞿秋白和茅盾	147
四、《〈子夜〉是怎样写成的》	157
五、围绕《子夜》的一些问题	163
六、《春蚕》和《林家铺子》	173
七、《自由谈》和杂文	179

第四章 流浪中的茅盾

——抗日时期和内战时期

一、上海、香港、乌鲁木齐	190
二、香港、桂林、重庆	198
三、《腐蚀》、《霜叶红似二月花》、《锻炼》	203

日译茅盾主要著作目录	209
------------	-----

茅盾年谱简编	218
--------	-----

后 记	249
-----	-----

译后记	252
-----	-----

第一章

雾、虹和红叶
——茅盾在京都

一、京都的雾

.....

答，答，答！

这第三次的叩声，在冷空气中扩散开来，格外的响，颇带些凄厉的气氛。我无论如何再耐不住了，我跳起身来，拉开了门往外望。

什么也没有。镰刀形的月亮在门前池中送出冷冷的微光，池畔的一排樱树，裸露在凝冻了的空气中，轻轻地颤着。

什么也没有，只一条黑狗爬在门口，侧着头，象是在那里偷听什么，现在是很害羞似的垂了头，慢慢地挨到檐前的地板下，把嘴巴藏在毛茸茸的颈间，缩做了一堆。

我暂时可怜这灰色的畜生，虽然一个忿忿的怒斥掠过我的脑膜：

是你这工于吠声吠影的东西，丑人作怪似的惊醒了人，却只给人们一个空虚！

——《叩门》

早上醒来的时候，听得卖豆腐的哨子在窗外呜呜地吹。

每次这哨子声引起了我不少的怅惘。

并不是它那低叹暗泣似的声调在诱发我的漂泊者的乡愁；不是呢，象我这样的outcast^①，没有了故乡，也没有了

^①outcast，英语，意指无家可归的人或漂流的人。

祖国，所谓“乡愁”之类的优雅的情绪，轻易不会兜上我的心头。

也不是它那类乎军笳然而已颇小规模悲壮的颤音，使我联想到另一方面的烟云似的过去；也不是呢，过去的，只留下淡淡的一道痕，早已为现实的严肃和未来的闪光所掩煞所销毁。

所以我这怅惘是难言的。然而每次我听到这呜呜的声音，我总抑不住胸间那股回荡起伏的怅惘的滋味。

.....

呜呜的声音震破了冻凝的空气在我窗前过去了。我倾耳静听，我似乎已经从这单调的呜呜中读出了无数文字。

我猛然推开幃子，遥望屋后的天空。我看见了些什么呢？我只看见满天白茫茫的愁雾。

——《卖豆腐的哨子》

.....

现在那照例的晨雾把什么都遮没了，就是稍远的电线杆也躲得毫无踪影。

渐渐地太阳光从浓雾中钻出来了。那也是可怜的太阳呢！光是那样的淡弱。随后它也躲开，让白茫茫的浓雾吞噬了一切，包围了大地。

我诅咒这抹煞一切的雾！

我自然也讨厌寒风和冰雪。但和雾比较起来，我是宁愿后者呵！寒风和冰雪的天气能够杀人，但也刺激人们活动起来奋斗。雾，雾呀，只使你苦闷，使你颓唐阑珊，

象陷在烂泥淖中，满心想挣扎，可是无从着力呢！

旁午的时候，雾变成了牛毛雨，象帘子似的老是挂在窗前。两三丈以外，便只见一片烟云——依然遮抹一切，只是雾样的罢了。没有风。门前池中的残荷梗时时忽然急剧地动摇起来，接着便有红鲤鱼的活泼泼地跳跃划破了死一样平静的水面。

我不知道红鲤鱼的轨外行动是不是为了不堪沉闷的压迫？在我呢，既然没有杲杲的太阳，便宁愿有疾风大雨，很不耐这愁雾的后身的牛毛雨老是象帘子一样挂在窗前。

——《雾》

以上摘自茅盾于一九二八年末、即昭和三年末，在京都写的三篇随笔的片断。

这一时期他写的几篇随笔都是这么阴暗。从中可以看出匆匆到达京都的茅盾，面对着初冬的寒冷而显得阴郁的京都的天空，发出深沉的叹息的模样。一切都掩盖在模模糊糊的雾里了。就是这雾封锁了我的心灵。偶尔露出软弱无力的面孔的太阳，一会儿也为雾气淹没了。

这些显然都是茅盾在选定古都——京都为其居处时的内心景象。茅盾精神暗淡，心境沉重。一九二五年在上海，一九二六年在广州，接着一九二七年在武汉，他那熊熊燃烧着的对革命的热情，对改革的希望，全部被残酷地粉碎了，热情和希望也被冰冷而无限深沉的浓雾所淹没，吞噬无余，从而失去了光和热。

在陌生的异国土地上，在装有不习惯的榻榻米和障子的出租房屋里，他被那守夜不眠而象是在偷听什么的黑狗所发出的答

答响声折磨着神经，对初次听到的卖豆腐的哨子声感到怅惘，阴郁的京都盆地的寒冷雾气，不断地刺激着他的心情。尽管茅盾自称为 outcast，并且认为对于“没有了故乡，没有了祖国”的人，是不会轻易兜上所谓“乡愁”之类的优雅情绪的，因为过去的事“早已为现实的严肃和未来的闪光所掩煞所销毁”，所以不愿回想往事，并极力否定它们。但是，当他在否定之际，无法否定的内心一定会同时勾起一种悔恨和无可忍受的情绪。如若不然，在《叩门》一文中他就没有必要写出象是要把结尾舍弃的那一段。而且，在《卖豆腐的哨子》中，除上面引用的片段之外，也不可能归纳出中间那一部分的观察的结果：

昨夜我在夜市上，也感到了同样酸辣的滋味。

每次我到夜市，看见那些用一张席片挡住了潮湿的泥土，就这么着货物和人一同挤在上面，冒着寒风在嚷嚷然叫卖的衣衫褴褛的小贩子，我总是感得了说不出的怅惘的心情。说是在怜悯他们么？我知道怜悯是褻薄的。那么，说是在同情于他们吧？我又觉得太轻。我心底里钦佩他们那种求生存的忠实的手段和态度，然而，亦未始不以为那是太拙笨。我从他们那雄辩似的“夸卖”声中感得了他们的心酸的哀诉。我仿佛看见他们吁出的热气在天空中凝集为一片灰色的云。

可是他们没有呜呜的哨子。没有这象似闷在瓮中，象似透过了重压而挣扎出来的地下的声音，作为他们的生活的象征。

茅盾对地面上只铺着席片的夜市情景怀有奇异之感，同时

耳中听着小贩的叫卖声，从中来衡量着生活在底层的人民大众的心情。在他心目中，可以说日本和中国的境界已经消失。也许他的思潮早已飞回到自己的故乡浙江省的节日和集市去了。总之，不能不认为，在他那有如从地下涌出来的单调的卖豆腐的哨子声中，所发出来的无数文字中，蕴藏着为大革命而生，又为它而死的年青人的“心的哀诉”。

我大胆地在文章开头就把以往很少向日本介绍，很少在日本加以评论的茅盾这一时期的随笔加以介绍，这不单单因为这些随笔是在日本京都写的。而是由于从茅盾的这些非常近似鲁迅散文集《野草》的随笔中，能够推测出茅盾当时的心境，并且能够感受到茅盾当时情绪阴郁的程度。显然，这种阴郁是来源于对大革命挫折的体验，可说是一种窥见深渊的人所具有的阴郁。已经窥见无底深渊的茅盾，所选择的苏醒之路是执笔创作长篇小说《蚀》。可是，他所说的：“我只能让它这样写下来，作一个纪念；我决计改换一下环境，把我的精神苏醒过来。”（《从牯岭到东京》）这是指三部曲《蚀》中的第三部分《追求》，这些话只不过是“我很抱歉，我竟作了（《追求》）这样颓唐的小说”，以及“我是越说越不成话了。但是请恕我”等话的续句而已。

《蚀》是作为纪念而写的，可是它并没有能够与茅盾的苏醒完全连结成一体，即使他那样解释，也不能说服人。只能说他被淹没在雾气之中的心境的阴暗和郁闷的程度有着浓淡之差，而这种情形正是构成为他写这些随笔的基调，正是它限定了作家茅盾的出发点，换言之，在研究茅盾这位作家时，不正可以把他旅日时期的作品，作为一个基轴来加以分析吗？而这仅仅是本书的小小的设想而已。

二、茅盾到日本和景云里

一九二八年七月，茅盾悄然来到日本。当时年龄刚满三十二岁。不知道他是何时从上海出发，经由哪条航线，到达何处的。根据当时的情况，其航程不过两日至数日，但无人知晓茅盾初次看到日本的葱绿的山影和港口闪烁的灯光时作何感想。譬如郁达夫，他比茅盾早十一年来到日本，他在以后把有关长崎港口和濑户内海的风光的印象，写进自传《我的梦幻我的青春》中，而茅盾对此却毫无触及。我想在描写伤感的风景方面，茅盾尤为无缘。在这一点上，可能茅盾更甚于鲁迅。例如鲁迅在短篇小说《故乡》中，对风景也作了抒情的描写，而茅盾却很少有此类作品。此外，在和日本的关系上，鲁迅不管怎样，还忆起了《藤野先生》；可是对于茅盾，尽管在来日本的目的、时间、年龄上有差异，但他在此后的接触中，人们只能隐约窥见极淡漠的友情，茅盾自己还断言，在日本人中他没有朋友。

如果单纯地谈到抒情，那么在京都所写的十数篇随笔中，有茅盾某种心情的吐露，这明显地也是一种抒情；不过这在茅盾的整个文学生涯中，也是极为罕见的特异例子。

初次来到异国土地，不写感慨，这也许是个恰如其分的表示。如果是这样，那么，只有为浓雾所笼罩的京都，对于茅盾才是适合的吧！在那里正好与他突然流露出来的犹如地下声音涌出般的苦恼心情相适应。由于遭到大革命的挫折，他的伤痕是深沉的，心境是忧郁的。对于来到日本的有关事实，则初来

乍到，无须公开，但最终没有长期隐瞒的必要。

茅盾悄悄地来到东京，寓居旅馆，写了评论《从牯岭到东京》。根据他的记载，完成于七月十六日。

附带提一下，已故竹内好先生曾就茅盾来日本表示怀疑说：“茅盾真的来过日本吗？”并为之感到意外。这虽然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但对我却是个冲击，而且以为此话含意颇多，富有暗示。虽然目前无详细论述的必要，但这事却可能关系到我们对待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基本态度问题。现在根据从中国得到的资料，关于茅盾来过日本的事实已无可置疑。但在这里我有必要阐述一下如下的情况。

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下进行的大革命，由于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而解体失败，当时在武汉从事左派理论、宣传活动的茅盾，为了躲避追捕曾逃到疗养地牯岭，以后潜回上海。那是一九二七年的事。那年初他是和夫人一起由上海去武汉的，可能夫人先回到了上海。不久蒋介石发出了逮捕令，茅盾在潜回上海之前，他的家属就已传出茅盾已逃亡日本的风声。茅盾是八月底悄悄从牯岭回到上海，把自己关在景云里的家中埋头创作《蚀》的。茅盾在创作《蚀》的第一部《幻灭》的前半部分时，边看护妻子的病（据说是难产）边写作，写后半部分和第二部《动摇》、第三部《追求》时，妻子已恢复健康，他隐藏在自己家的三楼上写出来的。按照茅盾自己所记，从九月到次年一九二八年六月的十个月中，他没有出过自家的大门，直至第三部完成为止，几乎没有朋友来访，因此，除了四、五名家里人外，完全是与世隔绝的。

这四、五名家里人是谁呢？妻子孔德沚和母亲陈爱珠肯定

是，但不知道两个孩子，即长女霞和长子霜是否已经出世。当时茅盾唯一的兄弟沈泽民已经和妻子张琴秋去莫斯科；也许是妻弟孔另境和他住在一处。

特别使茅盾伤脑筋的是，住地景云里一带的邻人多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职员，他们几乎都认识茅盾。茅盾于一九一六年读完北京大学预科后，中途辍学直接进入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工作，一九二〇年起参加编辑杂志《小说月报》，直至一九二五年辞去《小说月报》主编为止，一直是该所的成员（“编译所”相当于编辑部）。因此，理应逃亡日本的茅盾，在这里碰到他们是有危险的。茅盾自己说：“此种蛰居生活无法长期继续下去，因此决定去日本。其后家属们（父亲和妻子）也能够安心地在别处找到房子搬家，从而能够离开熟人过多的环境。当时去日本最方便。因为不需要护照。”

总之，当传说着他“已去日本”时，茅盾正在上海写《蚀》。以后不得已才去了“方便的日本”。不过我认为这只是偶然的巧合。至少无法否认写《从牯岭到东京》这篇文章时不是在东京，而有可能是在上海或者是在中国的某地。因此，不能不承认竹内好先生怀疑茅盾曾来过日本也许是有其根据的。诸如此类的事情，在日本人研究有关中国作家时，我认为不能不经常注意留心。

碰巧在同一时期逃亡日本的还有另一位作家郭沫若。郭沫若参加了共产党军队在南昌的起义，败退后，经由广州、香港，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到达上海，开始计划逃亡苏联，后因启程前患斑疹伤寒，无法成行。不得已才决定和夫人一起（经不同路线），于一九二八年二月逃亡夫人的祖国日本，其后在市